

· 发展与教育 ·

网络欺凌中大学生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群体互动视角*

于明申¹ 柳希希² 鲍振宙^{**1}

(¹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赣州, 341000)

(²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赣州, 341000)

摘要 网络欺凌是受害者、欺凌者与旁观者的三元互动。在群体互动的背景下, 基于唤醒: 成本-回报模型, 考察网络欺凌中大学生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对 200 名大学生进行情境实验, 探究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及其三元交互效应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1) 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越低, 大学生的旁观行为越积极; (2) 受害者与旁观者社会距离越近, 大学生的旁观行为越积极; (3)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三元交互效应显著。在高隐私性披露条件下, 旁观者对严重性较高欺凌事件中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在低隐私性披露条件下, 无论欺凌严重性高或低, 旁观者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均更积极。

关键词 大学生 受害者自我披露 欺凌严重性 社会距离 网络欺凌旁观行为

1 引言

网络欺凌被喻为“看不见的拳头”, 指以电子信息交流工具为载体反复对他人实施的攻击行为 (Kowalski et al., 2014)。与传统欺凌相比, 网络欺凌因其间接性、匿名性与快速传播性, 可能带来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马倩倩, 2022; Slonje et al., 2013)。研究表明, 大学生经常使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交往, 网络欺凌在该群体中的发生率高达 67.62% (Wang et al., 2022)。遭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业困难、焦虑抑郁等情况, 严重者甚至表现出自杀意念 (柳希希, 2023; Martínez-Monteaudo et al., 2020)。然而, 网络欺凌事件并不仅是欺凌者与受害者的二元互动, 欺凌事件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旁观者群体。滕妍君 (2015) 对 1293 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 87.1% 的参与者报告在过去三个月曾目睹过网络欺凌事件。旁观者的不同行为可能会对欺凌事件的发生发展产生差异性影响 (Jeyagobi et al., 2022)。例如, 积极的旁观行为 (制

止欺凌者、安慰受害者) 能抑制欺凌事件、缓解受害者的痛苦。消极的旁观行为, 例如鼓动欺凌者并与其共同实施欺凌 (如点赞、发布恶意评论) 或“置身事外”, 会使欺凌者将行为合理化, 导致受害者经历更大的痛苦 (DeSmet et al., 2016; Kowalski et al., 2014)。随着大学生认知发展的成熟, 其具备积极干预网络欺凌的能力和策略 (孙雨, 孟维杰, 2022)。因此, 探讨哪些因素促使大学生做出积极旁观行为对遏制网络欺凌事件尤为重要。

目前, 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理论解释大多基于旁观者效应与旁观者干预模型 (马倩倩, 2022; 褚晓伟, 2020)。但上述模型难以全面地涉及各种因素及因素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对旁观行为的影响, 需从多元交互的视角对其进行解释 (黄勛喆等, 2019; Salmivalli, 2010)。其次, 现有研究大多模糊了旁观者行为意愿与实际行为的界限, 将旁观者的行为意愿当作实际行为进行研究, 缺乏对旁观者实际行为的讨论 (Zeng et al., 2023)。最后, 现有研究多采用相对静态的方式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进行测量 (问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1YJC19000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24 年度规划项目 (XL24104) 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 (2021 年) 基金青年项目 (21JY48)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鲍振宙, E-mail: baozhenzhou0819@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60307

卷法、回忆法），削弱了被试作为网络欺凌旁观者的真实体验，结果存在一定局限。

欺凌事件是群体背景下的暴力，不同角色群体在互动过程中强化彼此的行为（陈光辉，张文新，2018；Lagerspetz et al., 1982）。本研究将网络欺凌放在群体互动的背景下，从受害者、欺凌者及旁观者之间的互动入手，基于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Dovidio et al., 1991），分别选取自我披露（唤醒）、欺凌严重性（成本）、社会距离（回报）及其三元交互作用作为自变量，探讨它们对网络欺凌中实际旁观行为的影响，以期为预防和干预网络欺凌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建议。此外，本研究采用视频呈现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微博互动”情境，结合用户浏览微博时可能出现的互动界面与音效，增强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真实体验以提高研究生态效度。

1.1 受害者自我披露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自我披露被定义为个体有意与他人分享个人信息，例如个人观点、经历、感受等（谢笑春等，2013）。以往研究大多数采用深度来衡量自我披露的水平（Ma et al., 2024）。自我披露的深度指个体披露内容的隐私性程度（Wheless & Grotz, 1976），例如告诉他人自己的收入状况比告诉他人自己对某事看法的隐私性更高。根据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唤醒”描述了个体对他人遭遇事件的情绪反应（Dovidio, 1991）。网络欺凌情境中，受害者披露内容可能作为一种“唤醒”，引发旁观者基于披露内容是否遵从网络空间规范的评价与考量，从而影响其情感态度与行为积极性（余成峰，2024；Reicher et al., 1995）。低隐私性的自我披露被认为遵从网络规范，当这类披露者遭受网络欺凌时，更易“唤醒”旁观者的同情，因此其有可能提供帮助（Schacter et al., 2016；Vitak, 2012）。而高度个人化或隐私性的披露可能被视为“炫耀”或“获取关注”，更易“唤醒”旁观者的反感或回避，当其因自我披露内容遭受网络欺凌时，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较低（Zeng et al., 2023）。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程度越低，个体的旁观行为越积极。

1.2 欺凌严重性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欺凌严重性被定义为欺凌事件造成的伤害程度

（Van Noorden et al., 2016）。在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中，成本是指个体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或损失（Dovidio, 1991）。欺凌严重性可能作为“成本”分析因素，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决策。具体而言，旁观者的行为“成本”可能包含以下两种：帮助的个人成本（例如被欺凌者威胁等）以及不帮助的个人成本（例如内疚，担心负面评价等）（Wang, 2021）。目前研究针对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行为的影响存在分歧。有研究指出，当旁观者将网络欺凌事件评估为严重时，旁观者不干预事件的成本（内疚，担心负面评价等）可能会增加，为降低此成本，旁观者有可能支持、帮助受害者，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Macaulay et al., 2019）。但欺凌严重性越高，旁观者干预欺凌事件时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加（例如被欺凌者辱骂或暴露个人信息等），这可能导致旁观者的积极行为减少（Bennett & Banyard, 2016；Wang, 2021）。因此，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行为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

1.3 社会距离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社会距离是指个体感知到与他人的亲近程度，例如感知他人为朋友、熟人或陌生人（Bar-Anan et al., 2006）。唤醒：成本 - 回报模型中，“回报”是指个体行为所产生的预期积极结果（例如金钱补偿、社会赞扬等）。社会距离可能作为“回报”分析因素，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决策。在网络欺凌情境中，当旁观者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较近时，双方存在较强的心理联系和亲近感，旁观者更易感知到受害者的痛苦和需求（刘新燕等，2023；徐惊蛰，谢晓非，2011）。这种感知促使旁观者更倾向于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以期获得社会性回报，如维持社会关系，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等（Dovidio, 1991；Fischer et al., 2006；Fischer et al., 2011）。相反，对于远距离受害者而言，旁观者缺乏直接的心理联系和亲近感（Huang & Wyer, 2009）。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帮助行为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Dovidio, 1991）。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表现出消极旁观行为。综上，本研究假设：个体可能对近距离受害者表现出更积极的旁观行为。

1.4 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的交互效应

前文对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的主

效应进行了阐述,但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行为可能是群体互动的结果,有必要探讨不同群体因素间的交互作用(黄勛喆等,2019;Salmivalli,2010)。上述三因素中两两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例如,以往研究指出,欺凌严重性较高时,即使受害者在事件中存在不当行为(高隐私性自我披露),旁观者仍倾向于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Koehler & Weber,2018)。其次,以往研究发现自我披露与社会距离也存在交互作用,个体更能容忍亲近之人(社会距离较近)的高隐私性自我披露,并在其因不当自我披露而遭受网络欺凌时伸出援手(Zeng et al.,2023)。此外,对于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而言,以往研究表明旁观者可能会不顾潜在风险成本(高严重性)而选择对朋友(近社会距离)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Desmet et al.,2014)。目前,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的三元交互作用的研究仍显不足。唤醒:成本-回报模型为因素间的三元交互作用提供了可能解释:受害者自我披露作为一种“唤醒”,引发旁观者不同情感态度,旁观者还会依据欺凌事件的严重性及其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进行“成本-

回报”的权衡。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旁观行为。因此,基于群体互动视角与唤醒:成本-回报模型,本研究旨在探究上述因素的三元交互作用对旁观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立足于群体互动视角,基于唤醒:成本-回报模型构建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1)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大学生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行为是否存在主效应?(2)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大学生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是否存在三元交互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预实验

2.1.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招募73名大学生($M_{age} = 20.30$ 岁, $SD = .84$ 岁,男生35名)对实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自我披露材料进行评定,61名大学生($M_{age} = 21.52$ 岁, $SD = 1.64$ 岁,男生29名)对网络欺凌事件中辱骂语句进行评定。

2.1.2 研究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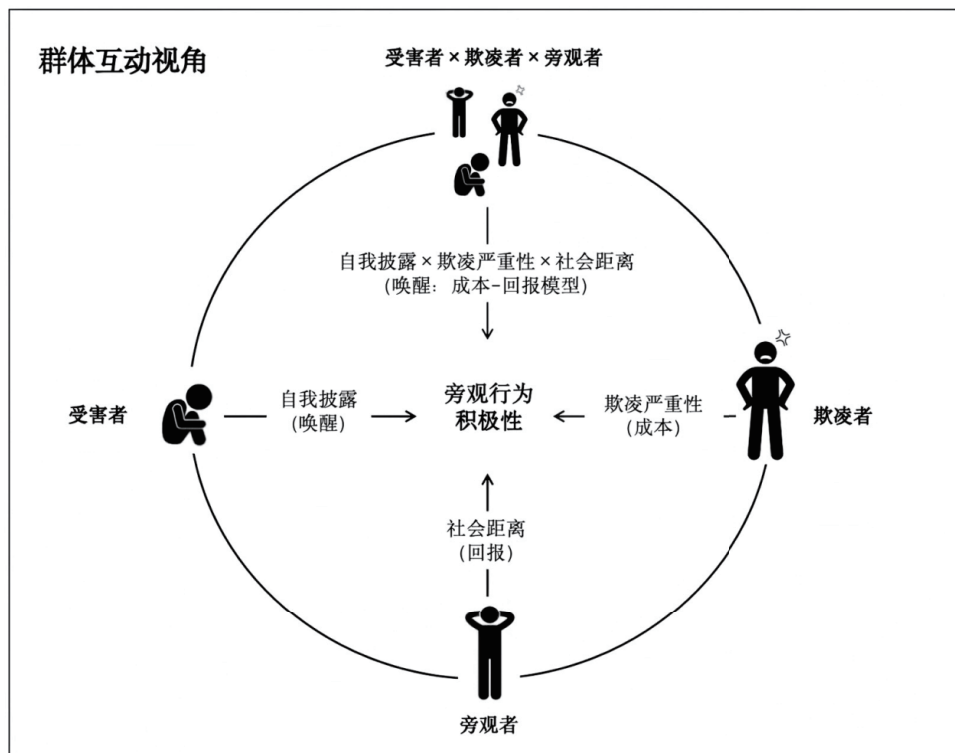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图

受害者自我披露。参考 Ma 等人 (2023) 的研究, 对个体网络自我披露的 10 段材料进行隐私性程度评定。首先通过 3 道题考察被试对于披露材料透露个人信息程度 (包括个人经历、看法意见及感受情绪) 的判断, 例如“他/她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或日常生活经历”。采用 7 点计分, 1 = “非常浅显”, 7 = “非常深入”。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披露程度越高。其次, 通过一题项“你认为他/她自我披露的水平有多高?” 来直观评估被试感知到的披露程度, 采用 7 点计分, 1 = “非常浅显”, 7 = “非常深入”, 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披露材料的隐私性程度越高。

欺凌严重性。使用褚晓伟 (2020) 编制的网络欺负事件严重性量表对 30 段辱骂语句进行严重性程度评定, 例如“你认为小 B (欺凌者) 对小 A (受害者) 的这种辱骂行为严重吗? ”。量表共 5 题, 采用 5 点计分, 从 1 至 5 分别表示“一点也不严重/完全可以接受/一点也没有趣/完全没有伤害/一点也不好笑”至“非常严重/完全不能接受/非常有趣/严重伤害/非常好笑”。其中第 3 题、第 5 题反向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表示欺凌严重性越高。

2.1.3 预实验 1 受害者自我披露材料的选定

首先, 分别从网络、以往研究等渠道查阅收集, 经过整理后选定 10 段自我披露语段编为待定的实验材料。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招募 73 名大学生对实验

材料进行自我披露隐私性的评定。

使用三题项与一题项 (共四题, 见 2.1.2 研究工具部分) 评定 10 段材料自我披露程度。依据被试的评分选取自我披露程度最高及最低的两段作为实验材料进行后续研究。研究结果如表 1 所示。

研究对三题项均分与一题项得分进行了相关分析 ($r_1 = .61, r_2 = .44, r_3 = .72, r_4 = .74, r_5 = .59, r_6 = .64, r_7 = .70, r_8 = .68, r_9 = .55, r_{10} = .56$)。最终根据三题项均分与一题项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 选定材料 4 ($r = .74, p < .001$) 与材料 7 ($r = .70, p < .001$) 分别作为自我披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实验材料进行后续分析 (见图 2)。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对自我披露材料隐私性高低评估的差异显著 (三题项: $t(72) = 4.66, p < .001$; 一题项: $t(72) = 7.01, p < .001$)。

2.1.4 预实验 2 欺凌者辱骂语句的选定

以往研究表明, 辱骂行为是网络欺凌中最普遍的行为类型 (马倩倩, 2022), 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一网络欺凌情境进行后续实验。分别从网络、以往研究等渠道查阅收集, 经过整理后对预实验 1 中高自我披露、低自我披露材料分别编制了 15 句辱骂语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选取 61 名大学生, 使用网络欺负事件严重性量表 (见 2.1.2 研究工具部分) 分别对 30 段辱骂语句 (高、低自我披露材料各 15 句) 进行严重性评定。30 名被试对低自我披露的辱骂语句进行评定, 31 名被试对高自我披露的辱骂语句进

表 1 自我披露程度评定结果

	他/她在社交媒体帖子中透露个人信息的程度 (包括个人经历、看法意见及感受情绪)			他/她自我披露水平的直观评估		
	<i>N</i>	<i>M</i>	<i>SD</i>	<i>N</i>	<i>M</i>	<i>SD</i>
材料 1	73	5.25	1.32	73	5.32	1.22
材料 2	73	5.14	1.27	73	5.04	1.11
材料 3	73	5.17	1.22	73	5.10	1.29
材料 4	73	5.30	1.26	73	5.27	1.29
材料 5	73	4.74	1.08	73	4.41	1.13
材料 6	73	5.17	1.26	73	5.01	1.22
材料 7	73	4.63	1.03	73	4.17	1.07
材料 8	73	4.52	1.34	73	4.42	1.31
材料 9	73	5.16	1.21	73	5.00	.99
材料 10	73	5.06	1.26	73	5.01	1.21



图2 高(左)、低(右)水平自我披露材料

行评定。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最终选定高、低自我披露条件下欺凌严重性程度不同的实验材料各两段(如图3a、图3b所示)。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自我披露条件下,被试对辱骂语句严重性高低评估的差异显著($t_{\text{高自我披露}}(30) = 18.55, p < .001$; $t_{\text{低自我披露}}(29) = 8.42, p < .001$)。

2.2 正式实验

2.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首先使用G*Power 3.1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所需样本量。以 F 检验为统计方式,显著性水平 $\alpha = .05$ 且 $d = .25$ 时,为达到90%的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171名被试。为了确保最终有足够数据用于分析,采用方便抽样法,共招募到202名被试。剔除两份规律作答数据,共获得200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99%(被试相关信息见表3)。

2.2.2 实验设计

表2 严重性程度评定结果

辱骂语句	高自我披露 ($N = 31$)	低自我披露 ($N = 30$)
	$M(SD)$	$M(SD)$
语句1	3.48(.65)	3.36(.40)
语句2	4.30(.48)	3.43(.32)
语句3	3.97(.63)	3.27(.30)
语句4	3.24(.47)	3.17(.42)
语句5	4.14(.74)	3.59(.37)
语句6	4.39(.55)	3.57(.26)
语句7	4.68(.47)	3.03(.34)
语句8	3.86(.93)	3.10(.36)
语句9	4.50(.66)	3.98(.49)
语句10	3.37(.88)	3.42(.32)
语句11	4.85(.24)	3.09(.34)
语句12	4.41(.60)	3.00(.42)
语句13	3.68(.82)	3.17(.41)
语句14	3.55(.58)	3.14(.44)
语句15	3.51(.91)	3.39(.54)



图 3a 高披露高严重（左）、高披露低严重（右）实验材料



图 3b 低披露高严重（左），低披露低严重（右）实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 2（高披露/低披露） \times 2（高严重/低严重） \times 2（远距离/近距离）的三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旁观网络欺凌时的行为积极性。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8 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每组 25 人。

2.2.3 实验程序

研究通过了所在学校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核，但考虑到被试需要目睹网络欺凌情境，因此在实验指导语中强调“实验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语句均来自于网络，仅为实验用途，请各位同学不要效仿。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在线上、线下分别招募被试。被试到达实验室后，由主试向被试详细介绍实验内容及注意事项，强调实验的保密性并要求其按自身的真实情况或想法作答。所得数据仅用于科研使用，同时指出被试可以选择拒绝作答令其感到不适的题项，并随时退出。本研究通过电脑呈现视频的方式进行网络欺凌情境模拟。整个施测过程持续 10 分钟左右，每名参与者在实验结束后可获得相应报酬。

实验共包括四个环节。首先，通过问卷收集被试的人口学信息，同时测量控制变量。其次，使用预实验结果对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进行高

表 3 被试相关信息

变量	$N = 200$
性别, n (%)	
男	97 (48.50%)
女	103 (51.50%)
年龄, M (SD)	21.20 (2.09)
网络欺凌经历, n (%)	55 (27.50%)
网络受欺凌经历, n (%)	71 (35.50%)
微博使用频率, n (%)	
很少	3 (1.5%)
偶尔	13 (6.5%)
有时	61 (30.5%)
经常	80 (40.0%)
总是	43 (21.5%)

低分组。社会距离的分组参照以往研究 (Zeng et al., 2023), 通过微博个人主页的介绍以及视频开始时的指导语强调被试与受害者的关系。其中, 近距离组被试会被告知, 受害者是他/她的好朋友, 并且在视频中会看到彼此微博“相互关注”; 远距离组被试会被告知, 受害者是一个陌生人, 并且在视频中受害者的微博从“超话”界面中随机刷新出现。看完视频后, 通过问卷对自变量操纵有效性进行检验。最后, 要求被试在受害者的微博评论区发表评论。

2.2.4 实验工具

(1) 自变量操纵有效性检验

受害者自我披露。参考 Ma 等人 (2023) 的研究, 在被试观看完实验视频后, 对其感知到的受害者网络自我披露程度进行评定。具体而言, 通过询问被试“你认为他/她 (小 A) 自我披露的水平有多高?” 来评估被试感知到的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程度。采用 7 点计分, 1 = “非常低”, 7 = “非常高”。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受害者自我披露隐私性越高。

欺凌严重性。参考褚晓伟 (2020) 的研究, 在被试观看完实验视频后, 对被试感知到的网络欺凌严重性进行评定。具体而言, 通过“看完微博后, 请你评估小 B 辱骂语句的严重程度”来评估被试感知到的欺凌严重性。采用 7 点计分, 1 = “一点也不严重”, 7 = “非常严重”。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欺凌事件严重性越高。

社会距离。在被试观看完实验视频后, 采用 Aron 等人 (1992) 的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IOS) 来评估被试感知到的与受害者之间的社会距离 (见图 4)。该量表常用于测量个体间的社会距离。被试对其与受害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评定, 分数越高, 代表被试感知到的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越近。

(2) 因变量

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积极性: 为进一步提高因变量测量的生态效度, 参照以往研究做法 (Zeng et al., 2023), 要求被试在浏览完网络欺凌情境后在受害者的微博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评论: “看完小 A 的微博以及小 B 对其的评论后, 请留下你的评论”。该方法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旁观者的实际行为。

每名被试的评论由三名受过评分训练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价 (研究人员不知道实验目的与被试的具体情况)。具体而言, 研究人员使用 5 分制来评估被试发表的评论: 1 = “消极”, 指对受害者的明确负面评论, 例如“不作死就不会死”; 2 = “有点消极”, 指被试以消极方式回应欺凌事件, 但并未明确针对受害者, 例如未留下评论, 或明确表示自己选择置身事外; 3 = “中性”, 指发布与受害者无关的评论, 例如“今天天气不错”; 4 = “有点积极”, 指对受害者的正面评价, 但是不能完全帮助受害者免于欺凌, 例如“感谢分享, 不要理那些负面评价”; 5 = “积极”, 指清楚地表明支持受害者或帮助受害者应对欺凌, 例如回复欺凌者“小 A (受害者) 想发布什么内容是自己的自由, 你 (小 B, 欺凌者) 不应该这样欺负他”。计算三位研究人员评分的平均数, 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旁观行为越积极, 反之则越消极。本研究中, 评分者一致性系数 $ICC = .74$, 表明评分者一致性系数可接受 (Cicchetti & Domenic, 1994)。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一些因素可能会对个体目睹网络欺凌时的旁观行为产生影响, 参考以往研究 (褚晓伟, 2020),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如下变量进行测量: 性别、年龄、网络欺凌经历、网络受欺凌经历、微博使用频率、道德推脱、移情。

网络欺凌经历。采用 Patchin 和 Hinduja (2015) 编制的网络欺凌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72。网络受欺凌经历: 采

看完微博后, 请你评估你与小 A 的社会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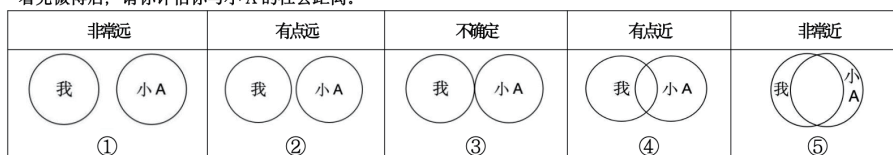


图 4 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

用 Patchin 和 Hinduja (2015) 编制的网络受欺凌量表进行测量,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79。微博使用频率: 通过一个题目(“请选择与你微博使用频率最匹配的描述”) 对实验研究中被试的微博使用频率进行评定。道德推脱: 采用 Thornberg 和 Jungert (2013) 修订的道德推脱量表,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71。移情: 采用基本移情量表中文版 (BES-C; 夏丹, 2011) 进行测量,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84。

2.2.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 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 同时采用方差分析分别对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及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主效应、三元交互效应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除性别与年龄外, 对上文提及的控制变量与旁

观行为积极性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如表 4 所示), 道德推脱、移情水平与旁观行为积极性显著相关。因此, 后续分析将性别、年龄、道德推脱、移情作为控制变量。

3.2 自变量操纵有效性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对于受害者自我披露程度、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的评定在不同水平间存在显著差异 ($M_{高披露}(SD) = 5.24(.98)$, $M_{低披露}(SD) = 3.43(1.39)$, $t(198) = -10.64$, $p < .001$; $M_{高严重}(SD) = 4.59(.68)$, $M_{低严重}(SD) = 2.74(1.01)$, $t(198) = -15.26$, $p < .001$; $M_{远距离}(SD) = 2.26(.93)$, $M_{近距离}(SD) = 3.97(.64)$, $t(198) = -15.15$, $p < .001$), 说明本研究成功操纵了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

3.3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与旁观行为积极性的方差分析

以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程度、社会距离为自变量, 旁观行为积极性为因变量, 性别、年龄、移情、道德推脱为控制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各组被试在旁观行为积极性上的均值与标准差如表 5 所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受害者自我披露的主效应显著:

表 4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M \pm SD$	1	2	3	4	5	6
1. 网络欺凌经历	1.08 \pm .15	1					
2. 网络受欺凌经历	1.14 \pm .26	.31***	1				
3. 微博使用频率	3.73 \pm .92	-.07	-.05	1			
4. 道德推脱	1.72 \pm .69	.17*	.13	.03	1		
5. 移情	3.74 \pm .51	-.03	.03	-.02	-.13	1	
6. 旁观行为积极性	3.61 \pm .84	-.02	.08	-.06	-.15*	.18**	1

表 5 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旁观行为积极性的均值与标准差

分组		N	M	SD	
高自我披露	近距离	高严重	25	4.16	.55
		低严重	25	3.41	.54
	远距离	高严重	25	2.67	.78
		低严重	25	3.36	.59
低自我披露	近距离	高严重	25	4.39	.83
		低严重	25	4.09	.55
	远距离	高严重	25	3.31	.71
		低严重	25	3.49	.70

$F(1, 24) = 24.38, p < .001, \eta^2 = .12$, 即与高自我披露受害者相比, 个体对低自我披露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欺凌严重性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4) = .45, p > .50$; 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1, 24) = 66.21, p < .001, \eta^2 = .26$, 即与远距离受害者相比, 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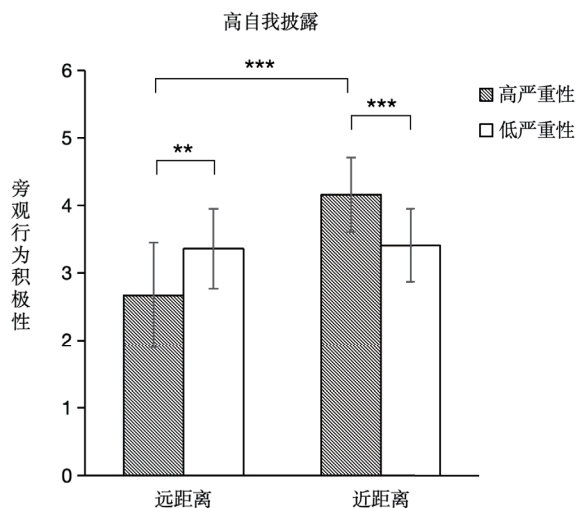


图5 高自我披露条件下, 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与旁观行为积极性的方差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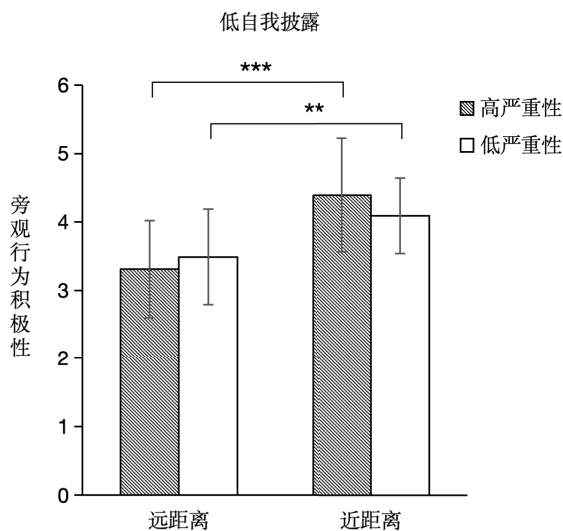


图6 低自我披露条件下, 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与旁观行为积极性的方差分析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的三元交互作用显著 (如图5、图6): $F(7, 192) = 10.11, p < .01, \eta^2 = .05$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受害者自我披露较高的条件下, 当欺凌严重性较高时, 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 ($M = 2.67, SD = .78$), 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 ($M = 4.16, SD = .55$) 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F(7, 192) = 62.96, p < .001, \eta^2 = .33$); 当

欺凌严重性较低时, 个体对远距离受害者 ($M = 3.41, SD = .54$) 和近距离受害者 ($M = 3.36, SD = .59$) 的旁观行为积极性没有显著差异 ($F(7, 192) = .08, p > .05$)。在受害者自我披露较低条件下, 当欺凌严重性较高时, 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 ($M = 3.31, SD = .71$) 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 ($M = 4.39, SD = .83$) 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F(7, 192) = 32.93, p < .001, \eta^2 = .17$); 当欺凌严重性较低时, 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 ($M = 3.49, SD = .70$), 个体对近距离受害者 ($M = 4.09, SD = .55$) 的旁观行为更积极 ($F(7, 192) = 10.16, p < .01, \eta^2 = .05$)。

4 讨论

鉴于积极旁观行为对遏制网络欺凌、减轻受害者痛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关注旁观行为对网络欺凌预防与干预的独特价值。本研究基于群体互动视角与唤醒: 成本-回报模型, 选择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构建了一个“网络欺凌情境”, 揭示了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及其三元交互作用通过“情感唤醒—成本权衡—回报预期”的复合路径作用于旁观行为。

4.1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主效应

首先, 与以往研究一致 (Forest & Wood, 2012; Weber et al., 2013), 本研究发现受害者自我披露对旁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强调“谦逊”、“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文化敏感性下, 个体过度展示个人隐私, 或有“炫耀”意味的披露内容可能“唤醒”旁观者对该内容的消极情感与态度, 从而更有可能选择“置身事外” (消极旁观行为) (Zeng et al., 2023)。相反, 低隐私性的披露内容因更贴近社会期待, “唤醒”了旁观者的同情或责任感, 进而其在目睹披露者遭受网络欺凌时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 (如声援或干预) (Schacter et al., 2016; Vitak, 2012)。

其次, 本研究发现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亲疏有别”很好地解释了旁观者对近距离受害者易采取积极旁观行为的原因。此外, 根据唤醒: 成本-回报模型 (Dovidio et al., 1991; Dovidio

et al., 2006; Schroeder et al., 1995), 帮助朋友所收获的“确定回报”(例如促进社会关系, 提升群体形象等)远大于帮助陌生人所获得的“可能回报”(例如社会赞许)。因此, 旁观者倾向于对近距离受害者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

此外, 本研究并未发现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行为的主效应, 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首先, 以往研究认为欺凌严重性与积极旁观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Macaulay et al., 2019), 但也有研究表明旁观者目睹严重性更高的欺凌事件时, 其干预风险也会更高, 进而减少积极旁观行为的出现 (Bennett & Banyard, 2016)。从该角度而言, 欺凌严重性与积极旁观行为并非呈线性正相关。其次, 本研究中的辱骂语句为网络渠道收集, 大学生群体频繁接触到网络欺凌事件 (滕妍君, 2015; Wang et al., 2022), 对这些辱骂语句可能产生情感麻木与习惯化。这可能削弱其对严重欺凌事件的反应强度, 减少积极旁观行为。第三, 本研究选取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构建网络欺凌情境, 被试可能受“微博用户数量众多”观念的影响, 导致旁观者群体的责任分散 (褚晓伟, 2020), 进一步降低出现干预行为的可能 (Armstrong, 2015; Obermaier et al., 2016)。最后, 以往研究指出环境中过剩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认知资源受限 (Filippov & Iastrebova, 2010), 由此引发某些信息被掩蔽或忽视。为了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 本研究采用了动态化呈现方式, 实验视频中不仅包含了微博界面, 还增加了设备解锁界面、微博进入动画等, 实验视频中的无关信息可能占用被试认知资源。此外,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以交互形式呈现在实验材料中, 被试可能对欺凌严重性的关注程度降低, 导致欺凌严重性的主效应不显著。

4.2 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社会距离对旁观行为的三元交互作用

本研究发现, 在受害者自我披露较高的条件下, 当欺凌严重性较高时, 相比于远距离受害者, 旁观者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更积极。在高隐私性披露条件下, 相比于低严重性事件, 旁观者可能会认为干预高严重性事件的安全性更低 (Bennett & Banyard, 2016)。正如唤醒: 成本 - 回报模型指出,

个体在行为决策时往往会“权衡利弊”, 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回报 (Dovidio, 1984)。因此, 当旁观者与受害者距离较远时, 一方面, 旁观者可能将陌生人的高隐私性披露内容解读为“炫耀”、“博取关注”, 进而“唤醒”旁观者对其的消极态度; 另一方面, 旁观者干预高严重性欺凌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遭受欺凌)可能大于他们预期获得的“回报”(社会赞许) (Bennett & Banyard, 2016)。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对陌生人因高隐私性自我披露而遭受欺凌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选择袖手旁观。相反, 当旁观者与受害者的社会距离更近(朋友)时, 旁观者可能会不顾欺凌事件的严重性而选择帮助朋友。一方面, 中国文化价值观强调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甚至为了和谐的关系而放松自己的原则或迁就他人。例如, 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亲亲相隐”(principle of kin concealment)的现象, 即主张在亲人、好友违法犯罪时有所袒护、隐瞒 (许文涛等, 2024)。因此, 个体对近社会距离受害者“不当”的自我披露行为容忍度更高 (Festinger et al., 1950; Tajfel & Turner, 2004), 更有可能做出积极旁观行为。另一方面, 根据唤醒: 成本 - 回报模型及以往研究, 相比于帮助的成本(例如被欺凌者辱骂、泄露个人信息), 选择不帮助朋友的成本(例如道德谴责、被群体排斥或孤立)可能更具威胁性 (Desmet et al., 2014; Dovidio, 1991)。因此, 尽管旁观者知晓干预欺凌的安全风险, 他们仍倾向于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

在低隐私性披露条件下, 无论欺凌严重性高或低, 旁观者对近距离受害者的旁观行为均更积极。这一现象可从中国文化背景与唤醒: 成本 - 回报模型的双重视角进行阐释: 首先, 低隐私性自我披露内容更符合中国社会对“慎言敏行”、“谦逊内敛”的社会期待, 减少了旁观者对受害者披露动机的负面揣测, 从而更易唤醒其同情与共鸣 (Dovidio, 1991; Zeng et al., 2023)。其次, 基于社会同一性理论与邻近效应, 旁观者倾向于将社会距离近的个体纳入“内群体”, 其帮助行为不仅源于情绪共感, 更受到群体归属需求的驱动 (Festinger et al., 1950; Tajfel & Turner, 2004)。当朋友因相对合理的披露内容遭受欺凌时, 帮助行为带来的“回报”(如强化

友谊、提升群体认同)被显著放大,而“成本”因素(如欺凌严重性引发的潜在风险)则因情感联结而弱化(Desmet et al., 2014)。因此,旁观者为彰显“情义”可能将干预视为维护人际纽带的责任,选择忽略对欺凌严重性(成本)的理性权衡,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旁观行为。

4.3 研究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群体互动视角,基于唤醒:成本-回报模型,关注大学生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积极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为网络欺凌预防与干预措施提供以下参考。首先,互联网并不是一座孤岛,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披露内容往往会有大量的观众。从受害者角度而言,个体可以选择利用隐私设置来限制谁可以查看或评论其披露的相关内容(Zeng et al., 2023),减少遭受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应完善网络欺凌的智能干预系统。例如,对社交媒体中大量披露内容进行深度机器学习,形成识别模型,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当系统检测到个体披露的某些内容隐私性程度较高时嵌入提醒信息。其次,从欺凌者的角度而言,自动检测干预措施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Kluck & Krämer, 2022)。例如,当人们使用某些词语或短语时,可以提醒其不文明表达可能对他人产生伤害。最后,当网络欺凌事件发生时,朋友和家人最有可能为受害者提供需要的社会支持(Zeng et al., 2023)。反欺凌政策应鼓励受害者主动向朋友、家人寻求帮助。相关部门与媒体也应积极对旁观行为进行宣传,让更多沉默的旁观者伸出援手。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克服与改进。第一,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于同一地区,被试均为大学生,在推广研究结论时应保持谨慎。第二,尽管以往研究指出,情境实验法具有良好的效度(Bastiaensens et al., 2014),但本研究的实验情境仍与真实、动态的网络欺凌情境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为了控制变量,在情境中我们省略了网名、头像等带有个人特征的相关信息(采用小A、小B作为网名以及不带有任何特征的白色头像)。理论上,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旁观者对事件的判断及后续行为(褚晓伟, 2020)。此外,为获得社会赞许,被

试可能倾向于表现出积极旁观行为。因此,未来研究应设计更具生态效度、更为实景化的网络欺凌情境实验(例如设计模拟聊天室来观察被试的真实反应,Barlinska et al., 2018),避免社会赞许效应。最后,本研究并未将自变量(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作为连续变量进行讨论(仅用高、低/远、近进行区分)。因此对“自我披露隐私性越低,旁观者的旁观行为越积极”及“社会距离越近,旁观者的旁观行为越积极”的结论在推广性上可能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连续变量,探讨它们对网络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群体互动视角,基于唤醒:成本-回报模型阐明了网络欺凌中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情境实验法发现大学生更倾向于帮助自我披露隐私性较低以及社会距离较近的受害者。此外,受害者自我披露、欺凌严重性与社会距离三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网络欺凌积极旁观行为的发生机制,为遏制网络欺凌,促进网络文明建设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 陈光辉,张文新.(2018).群体互动中的个体适应性:欺凌情境中的多重参与角色.《社区心理学研究》,5(1),53-74.
- 褚晓伟.(2020).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效应——基于网络群组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 黄勐喆,褚晓伟,刘庆奇,周宗奎,范翠英.(2019).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心理科学进展》,27(7),1248-1257.
- 柳希希.(2023).大学生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同情和道德自我评价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赣南师范大学,赣州.
- 刘新燕,张惠天,王璐.(2023).“悲”天悯人,还是“乐”善好施:受助者困境态度效价与心理距离对捐赠意愿的交互影响.《南开管理评论》,26(2),48-60.
- 马倩倩.(2022).网络欺负中受害者反应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心理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 孙雨,孟维杰.(2022).社会文化理论视阈下大学生网络欺凌的难题与破解.《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0(3),89-95.
- 滕妍君.(2015).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网络欺负中旁观行为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 夏丹.(2011).基于移情量表(BES)中文版的信效度及初步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
- 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网络自我表露的类型、功能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1(2),272-281.
- 徐惊蛰,谢晓非.(2011).解释水平视角下的自己——他人决策差异.《心理

- 学报, 43(1), 11–20.
- 许文涛, 张凯丽, 汪凤炎. (2024). “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 *心理科学*, 47(2), 375–383.
- 余成峰. (2024). 平台媒介的兴起：隐私保护的范式与悖论. *东方法学*, 5, 74–86.
- Armstrong, M. (2015). *An exploratory examination of the bystander effect in cyberbully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evada.
-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 Bar-Anan, Y., Liberman, N., & Trope, Y. (200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onstrual level: Evidence from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5, 609–622.
- Barlińska, J., Szuster, A., & Winiewski, M. (2018).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 bystanders: Role of affective versus cognitive empathy in increasing prosocial cyberbystander behavio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799.
- Bastiaensens, S., Vandebosch, H., Poels, K., Van Cleemput, K., Desmet, A., & De Bourdeaudhuij, I. (2014).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to bystanders'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 help the victim or reinforce the bull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 259–271.
- Bennett, S., & Banyard, V. L. (2016). Do friends really help friends? The effect of relational factors and perceived severity on bystander perception of sexual violenc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6(1), 64–72.
- Cicchetti, & Domenic, V. (1994). Guidelines, criteria, and rules of thumb for evaluating normed and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instruments in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6(4), 284–290.
- DeSmet, A., Deforche, B., Hublet, A., Tanghe, A., Stremersch, E., & De Bourdeaudhuij, I. (2014). Traditional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s correlates of psychosocial distress and barriers to a healthy lifestyle among severely obese adolescents—a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on prevalence and results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4(1), 224.
- DeSmet, A., Bastiaensens, S., Van Cleemput, K., Poels, K., Vandebosch, H., Cardon, G., & De Bourdeaudhuij, I. (2016). Deciding whether to look after them, to like it, or leave i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bystander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7, 398–415.
- Dovidio, J. F. (1984). Helping behavior and altruism: An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overview.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7(4), 361–427.
-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Gaertner, S. L., Schroeder, D. A., & Clark, R. D., III. (1991). 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 and the process of interventi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In M. S. Clark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rosocial behavior* (pp. 86–118). Sage.
-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Schroeder, D. A., & Penner, L. A. (200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social behavior*. Erlbaum.
-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 G., & Buchner, A. (2007). G*Power 3: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39(2), 175–191.
- Festinger, L., Schachter, S., & Back, K. (1950).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The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11(4), 268.
- Filippov, S., & Iastrebova, K. (2010). Manag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n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1(1), 121–138.
- Fischer, P., Gritemeyer, T., Pollozek, F., & Frey, D. (2006).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 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2), 267–278.
- Fischer, P., Krueger, J. L., Gritemeyer, T., Vogrincic, C., Kastenmuller, A., Frey, D., Heene, M., & Kainbacher, M. (2011).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517–537.
- Forest, A. L., & Wood, J. V. (2012). When social networking is not working: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recognize but do not reap the benefits of self-disclosure on Facebook.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3), 295–302.
- Huang, I. W., & Wyer, R. S. (2009).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 and the influence of charitable appeals: When imaging oneself as the victim is not beneficia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6(3), 421–434.
- Jeyagobi, S., Munusamy, S., Kamaluddin, M. R., Ahmad Badayai, A. R., & Kumar, J. (2022). Factors influencing negative cyber-bystander behavior: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 PP 965017.
- Kluck, J. P., & Krämer, N. C. (2022). “What an idiot!” –How the appraisal of the writer of an uncivil comment impacts discussion behavior. *New Media and Society*, 24(12), 2743–2762.
- Koehler, C., & Weber, M. (2018). “Do I really need to help?” Perceived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victim blaming, and bystanders'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victim.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2(4), Article 4.
-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 Lattanner, M. R.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4), 1073–1137.
- Lagerspetz, K. M. J., Björkqvist, K., Berts, M., & King, W. (1982). Group aggression among school children in three schoo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3, 45–52.
- Ma, J. S., Gao, S. M., Wang, P., & Liu, Y. F. (2024). High level of self-disclosure on SNSs facilitates cooperation: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trus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50, 107976.
- Macaulay, P. J., Boulton, M. J., & Betts, L. R. (2019). Comparing early adolescents' positive bystander responses to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The impact of severity and gender.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 Behavioral Science*, 4(3), 253–261.
- Martínez-Monteaugado, M. C., Delgado, B., Díaz-Herrero, Á., & García-Fernández, J. M. (2020).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thinking,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tres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victims of cyberbullying. *Psychiatry Research*, 286, 112856.
- Obermaier, M., Fawzi, N., & Koch, T. (2016). Bystanding or standing by? How the number of bystanders effects in the intention to intervene in cyberbullying. *New Media and Society*, 18(8), 1491–1507.
- Patchin, J. W., & Hinduja, S. (2015). Measuring cyberbullying: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3, 69–74.

- Reicher, S. D., Spears, R., & Postmes, T. (1995).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phenomena.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6*, 161–198.
- Salmivalli, C.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5*(2), 112–120.
- Schacter, H. L., Greenberg, S., & Juvonen, J. (2016). Who's to blame? The effects of victim disclosure on bystander reactions to cyberbully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7*, 115–121.
- Schroeder, D. A., Penner, L. A., Dovidio, J. F., & Piliavin, J. A. (1995). *The psychology of helping and altruism: Problems and puzzles*. McGraw-Hill.
- Slonje, R., Smith, P. K., & Frisén, A. (2013). The nature of cyberbullying, and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1), 26–32.
- Tajfel, H., & Turner, J. C. (2004).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sychology Press.
- Van Noorden, T. H. J., Bukowski, W. M., Haselager, G. J. T., Lansu, T. A. M., & Cillessen, A. H. N. (2016). Disentangling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with empathy. *Social Development, 25*(1), 176–192.
- Vitak, J. (2012). The impact of context collapse and privacy on social network site disclosur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56*(4), 451–470.
- Wang, H. X., Zhou, L., & Lei, L. (2022). Using shattered assumption theory to understand how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is linked with perceived control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21–22), NP19624–NP19643.
- Wang, S. (2021). Standing up or standing by: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media. *New Media and Society, 23*(6), 1379–1397.
- Weber, M., Ziegele, M., & Schnauber, A. (2013). Blaming the victim: The effects of extra version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guilt attributions in cyberbullying.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4), 254–259.
- Wheeless, L. R., & Grotz, J. (1976).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ported self-disclosur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338–346.
- Zeng, Y., Xiao, J., Li, D., Sun, J., Zhang, Q., Ma, A., Zuo, B., & Liu, X. (2023). The influence of victim self-disclosure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cyberbullying. *Behavioral Sciences, 13*(10), 829.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Yu Mingshen¹, Liu Xixi², Bao Zhenzhou¹

(¹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²Gannan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Ganzhou, 341000)

Abstract Cyberbullying refers to a form of repeated harassment that use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ools.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can insult, threaten, defame, harass, or isolate others by posting comments, uploading photos or videos, or sending instant messages. College students, who frequently use the internet or social media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re more prone to experiencing cyberbully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 suffer from cyberbullying may exhibit anxiety, depression, academic difficulties, and in severe cases, even suicidal ideation. Cyberbullying is usually described as a group interaction process that includes not only the bi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ullies and victims, but also bystanders who witness the bullying. Generally speaking, negative bystander behaviors can exacerbate cyberbullying, while positive bystander behaviors can prevent further deterior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cyberbullying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among victims, bullies, and bystanders, rather than targeting a single group or ro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ystander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bystander intentions are not equivalent to their behaviors, participants may report intentions but not engage in corresponding behavior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clear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bystander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which may fail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and 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 exploring the roles of self-disclosure (victims/arousal), bullying severity (bullies/cost), and social distance (bystanders/reward).

Prior to conducting the formal experiment, we evaluated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rough a pre-experiment. The formal experiment presents cyberbullying situations through video methods. Two hundred college students ($M_{\text{age}} = 21.20$, 48.50% boys) were assigned to eigh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victims' self-disclosure,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bystander behaviors on cyberbullying. Self-disclosure and severity of cyberbullying were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group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experiment. Social distance was manipulated in the experiments: participants in the distant group observed the victim as a stranger, while participants in the close group were informed that the victim was a friend of thei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Lower level of victim's self-disclosure resulted in more positive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F(1, 24) = 24.38, p < .001, \eta^2 = .12$; (2) Closer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victims and bystanders resulted in more positive bystander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F(1, 24) = 66.21, p < .001, \eta^2 = .26$; (3)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effect of victim's self-disclosure, severity,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bystander behaviors on cyberbullying was significant: $F(7, 192) = 10.11, p < .01, \eta^2 = .05$. When the victim's self-disclosure was higher, in the high-severity events, the bystander behaviors were more positive towards the closer victims compared with the distant victims ($F(7, 192) = 62.96, p < .001, \eta^2 = .33$). In the low-severity ev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oser victims and the distant victims ($F(7, 192) = .08, p > .05, \eta^2 = .04$). When the victim's self-disclosure was lower, bystanders' behaviors were more positive towards the closer victim regardless of whether bullying severity was high ($F(7, 192) = 32.93, p < .001, \eta^2 = .17$) or low ($F(7, 192) = 10.16, p < .01, \eta^2 = .05$).

Overall, the present study is ground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interaction and the arousal-cost-reward model of cyberbullying. Using experimental method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elf-disclosure, bullying severity, social distance,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s on bystander behaviors. The results provide a novel approach to intervening in bystander behaviors in cyberbullying.

Key words cyberbullying, victims' self-disclosure, severity, social distance, bystander behaviors